

近三十年中国人移民菲律宾原因探析

代 帆

(暨南大学 东南亚研究所, 广东 广州 510632)

[关键词] 田野调查; 菲律宾; 新移民; 国际移民

[摘 要] 本文通过田野调查的方法, 对近 30年来以各种方式移民到菲律宾的中国新移民概况进行了梳理分类并探析了其移民原因。认为中国公民之所以移民到经济并不发达的菲律宾, 除了历史、移民文化以及移民网络等因素外, 还在于菲律宾的比较优势以及中国移民的族群经济, 为中国新移民的海外生存提供了机遇, 并且极大地降低了移民的风险和成本。国际移民的趋势并不一定遵循着从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流动的固定路线, 低收入国家所蕴含的机遇也是吸引国际移民的重要因素。

[中图分类号] D634.33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2010)01-0032-11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Chinese Emigration to the Philippines since the late 1970s

DA I Fan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Key words: fieldwork study; the Philippines; new migrant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bstract: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citizens have emigrated to the Philippines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Based on the fieldwork study conducted i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this article categorizes the new Chinese migrants flowing into the country, either legal or illegal, while analyzing the motivations and factors behind such a population flow. The author argues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 migration culture and migration network, the relative advantage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unique ethnic economy niche enjoyed by the Chinese migrants do provide new Chinese migrants with opportunities necessary for their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not to mention that it has greatly reduced the risk and cost of migration. It is concluded by pointing out that the flow of international migrant does not necessarily move from the low-income countries to the high-income ones, and the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 provided by the low-income countries could sometimes be more important in attracting international migrants.

20世纪 70年代中期以来, 随着中国与菲律宾双边关系的改善, 又有一批中国人沿着先辈的足迹, 陆续移民到菲律宾。在这一波移民潮中, 前期的中国移民以家庭团聚为主, 因为

菲律宾政府在 1950年完全取消了中国移民配额, 导致无数华人家庭的分离; 而自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的移民, 则往往依靠朋友或者同乡的关系移民菲律宾, 可说是前期移民网

[收稿日期] 2009-06-10; [修回日期] 2009-09-29

[作者简介] 代帆, 男, 政治学博士,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讲师。

*笔者感谢旅菲华侨工商联总会、旅菲校友联、中国商会、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等华侨华人社团组织, 菲律宾大学亚洲中心以及菲律宾移民局和退休署等相关机构对本研究的支持和帮助。

络的拓展。如果说历史上中国人离开故乡乃是迫于贫穷、饥荒、政治动荡等原因，70年代末期以来的移民主要是出于家庭团聚也在情理之中，那么90年代以来源源不断的中国移民则发生在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并日益强大的背景之下，这又是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不选择经济更为发达的西方国家，而是选择了经济较中国落后、本身又在不断向外移民的菲律宾？

2007—2008年间，笔者在马尼拉进行了为期七个月的田野调查。期间，笔者利用参加华人社团会议、活动等机会以及在马尼拉中国城中国新移民聚集的商业中心等，随机发放问卷300多份，回收有效问卷126份，并专门深度访谈了其中的近三十人。在样本的选择上，笔者尽可能做到兼顾广泛性和代表性。此外，笔者还通过访谈和电子邮件的方式采访了部分菲律宾华人及菲华商联总会、菲华青年企业家协会等社团领袖。本文力图在上述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菲律宾中国新移民概况

1950年，菲律宾以中国大陆政权更迭，防止共产党分子渗透以及台湾方面拒绝解决逾期游客问题为由，完全取消了之前已逐年削减的中国移民数额，由中国大陆到菲律宾的正规移民途径被完全截断。因此，在1975年中菲建交之后从中国到菲律宾的移民以家庭团聚为主，这一阶段的中国移民主要投靠他们在菲律宾的直系亲属，如另有妻室的父亲，也有少部

分人依靠他们在菲律宾的远亲。第二阶段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的新移民主要投靠他们在菲律宾的姑姑、舅舅和叔叔之类的亲戚。第三阶段从90年代中期一直到现在，这一批新移民往往并没有在菲律宾的亲戚，主要依靠朋友或者同乡，可说是前两阶段移民网络的拓展。^[1]

三十年源源不断的移民在菲律宾衍生了一个庞大的新移民社会。根据菲律宾移民局提供的数据，截至2008年2月，菲律宾共有合法的中国公民44,355人，其中持移民证件的有35,455人。基本而言，持有移民签证或者获得菲国长期居留权的中国公民可分为如下几类：

1. 通过特赦获得永久居留权。1988年和1995年，菲律宾政府先后实行两次特赦，赋予符合条件的非法移民以合法居留权，总共有1.1万左右的外侨因此合法化，并依照菲律宾法律，为他们的配偶和子女申请到居留权。^[2]不过，一些不符合特赦要求的非法中国移民，在旅行社或中国方面的帮助下提供虚假文件，或者直接贿赂菲律宾的移民局官员，制造虚假的入境记录，为自己或其“直系亲属”获得居留权，具体数目不得而知。如果菲律宾非法移民的主体为中国公民，那么获得合法居留权的主申请人及其“配偶”和“子女”就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2. 投资移民和退休移民。根据菲律宾法

在马尼拉中国新移民中进行问卷调查难度极大。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Kaisa）的学者告诉笔者，以往由菲律宾华人学者所作的同类实地调研中，问卷回收率也非常低，中国新移民流动性强、忙于生计、不关心、不理解、害怕等都是其中的原因。笔者往往需要采访多次才可完成一次深度访谈。

本文中的中国新移民，主要指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从中国大陆移居到国外、以长期经商或定居为目的的跨国群体，目前正在求学的中国留学生以及中方的劳务输出人员和企业外派人员不包含在内。而那些学成后长期定居国外以及在劳务期满后滞留当地非法就业的人，则包括在其中。尽管如此，要清晰准确地界定这一群体的概念与内涵仍非易事。

据菲国移民局的解释，移民签证签发给那些希望在菲律宾永久居留的外国公民，包括配额和非配额两部分。前者按照一定的优先秩序签发给那些拥有他国国籍或者无国籍者，后者则签发给那些与菲律宾公民结婚的外国人。

参见 Teresita Ang See, “Influx of New Chinese Immigrants to the Philippines: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Mette Thuno ed., *Beyond Chinatown: New Chinese Migration and the Global Explanation of China*,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2007, p. 141. 据 Teresita Ang See (洪玉华) 介绍，在菲律宾的非法移民中，中国大陆公民占70%~80%。

律，只要在菲律宾投资 7.5 万美元，或购买股票、房地产，或者银行存款，就可获得特别投资居留签证（SRV）。目前给予中国公民的配额是每年五十名，从 2003 年开始实施。此外，菲律宾休闲退休署还在中国推行特别退休居住签证（SRRV），即凡 35~49 岁者，只要在菲存款 7.5 万美元，50 岁或以上者只需存款 5 万美元，即可获得菲国永久居留权。自 1987 年到 2008 年 3 月 24 日，获得 SRRV 的中国大陆公民有 1662 人，加上其家庭成员共 4329 人。

2008 年 11 月，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又签署了特别创造就业签证（SVEG）的第 758 号行政令，并在 2009 年 3 月正式生效。该法令规定外国人投资的公司每雇用 10 名菲律宾人，就有一个特别创造就业签证的申请名额。在一家企业公司中行使管理职能并有权雇用、开除或提拔员工的外国人可以申请特别创造就业签证，只要其所在的公司提供担保。相信该法令将为中国公民申请菲律宾永久居留证提供一条新的途径。就在该法令实行不到一个月之内，菲律宾国家电网公司的一位中国投资者兼高层行政人员已成为获得“特别创造就业签证”的第一人。^[3]

3. 因与菲律宾公民结婚，继承遗产或收养关系而获得永久居留权。

此外，菲律宾还存在一个数量庞大的非法中国移民群体，主要包括如下几类：

第一，合法入境、非法滞留当地工作。不少中国公民持旅游或劳工签证合法进入菲律宾，然后滞留当地工作，这包括目前菲律宾中国非法移民的主体——在菲律宾从事零售和批发业的中国商人。2005 年菲律宾政府简化中

国游客和投资客的入境手续后，前往菲律宾的中国人骤然增加，无疑也推动了中国非法移民数量的继续增长。第二，非正常途径入境。即在菲律宾移民局官员的帮助下经由非正常通关入境，有离境需要时，再通过移民局官员不经过正常手续直接离境登机。因此，鉴于部分人出入菲律宾而没有留下记录，即便是菲律宾政府掌握的移民数据肯定也是不准确的。此外，还有一些人属于合法和非法之间。这部分人通过购买菲律宾公民的出生证，改名换姓获得菲律宾人的身份，严格而言仍属于违法，实际上也不包括在菲律宾官方统计的合法移民之列，但他们在菲律宾出生的后代却可因此获得菲国国籍。

目前对菲律宾中国新移民数量的估计，一般认为是 20 万人左右，绝大多数中国移民都不具备合法的身份。

二、移民原因探析

20 世纪以来，随着民族国家的大量出现，国际移民与主权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国际移民的研究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国际学术界从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角度对国际移民进行了全方位研究，各种理论层出不穷，如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Neoclassical Economics）、新经济移民理论（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Segmented Labor Market Theory）、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s Theory）、移民网络说（Network Theory）和累积因果关系说（Cumulative Causation），等等。

其中最早阐述移民动力机制的理论是推—

根据菲律宾退休署提供的数据，若加上香港（560）、澳门（20）、台湾（3273），总共为 8182 人。

也有少数中国公民通过与菲律宾公民假结婚的方式获得菲国永久居留权，笔者认识或采访过这样的新移民。

菲律宾《零售贸易自由化法》规定，外国人零售店的资本不能低于 83 万美元，零售店母公司的资本额不能低于 2 亿美元，而对于经营高档商品或奢侈品的商店，最低净值则不应少于 5000 万美元。

笔者的一个受访对象即在 1985 年通过这种方式来到菲律宾。

参见 Roel Landingin, “Paradox for Philippines as Chinese set up shop”, *Finance Times*, July 24, 2007; Teresita Ang See, *Ibid* p. 140; 李天荣：《中国新移民，菲国新动力》，（香港）《亚洲周刊》2002 年 8 月 30 日，第 7 页。上述资料都估计菲律宾中国新移民的数量在 20 万左右。

拉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左右人口迁移的动力，是推拉因素作用的结果。“推力”指原居地不利于生存、发展的种种因素，如经济停滞、政治或宗教迫害，甚至还有环境问题。“拉力”则是移入地所具有的吸引力，如工作机遇、政治或宗教自由，或者更好的气候和生活方式，等等。不同的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所面临的“拉力”和“推力”又是不同的。^[4]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则是从经济动机来分析国际移民的，该理论假定劳动力以外的其他市场是完全的且运行良好，对移民行为不产生影响，认为移民源于国际间劳动力市场的不均衡，由此产生了对预期工资的差异。人们移民是因为他们想在国外获得更高的净收益。劳动力逐渐从低工资国家流向高工资国家，直到达至均衡状态——即国际工资差距正好等同于国家间移民的成本，移民活动就会停止。^[5]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的模式，新经济移民理论以家庭而非个人作为追求效益最大化的主体，认为国际移民源于劳动力市场以外其他市场的失败。在发展中国家，资本（capital）、期货（futures）和保险（insurance）等市场缺失或者是不完全的，为了规避收入、生产和财产方面的风险，或者获取稀缺的投资资本，家庭会把一个或多个成员送到国外的劳动力市场。^[6]

这些理论丰富了世人对国际移民的认识，鉴于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这些理论已有引介和评论，^[7]笔者在此不再赘述。笔者要强调的是，这些理论确实能够解释诸多移民现象，如世界体系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新经济移民理论从宏观层面上解释了发达国家吸引外来移民的原因，但因其大多基于经验研究或者个案研究，因此并不能解释或者涵盖当今世界复杂的移民现象，诸如工资和收入水平差距、经济平衡等概念皆出自对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移民经验的概括，却不一定适合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移民体

验。以中国为例，除欧美发达国家之外，就连类似菲律宾、南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国等不发达国家也成为中国新移民的目的地。但中国学界现有的对中国移民现象的研究及相关理论探讨，大多仍集中在发达国家的中国移民，而对不发达国家的中国新移民的研究则相对欠缺。

鉴于此，笔者将综合运用已有的国际移民理论，结合笔者的实地调查和访谈，从移出地和移入地双向的角度探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以来中国人移民菲律宾的原因。

（一）社会资本：历史、文化与移民网络

移民网络说认为，移民网络就是通过亲情、友情和乡情等方式将原居地和目的地的移民、以往移民和非移民联系起来的一系列人际关系。这些关系的存在被假定为因提高收益、降低成本和国际移民的风险，而增加了对外移民的可能性。^[8]与菲律宾历史上的中国移民相比，70 年代末期以来中国新移民的来源相对要广，包括来自辽宁、山东、江苏、上海、广西等福建以外的省份。不过，福建——尤其是泉州地区的移民仍然是菲律宾中国新移民的主体。正如第一部分在探讨中国公民移民菲律宾的三个阶段时所谈到的，20 世纪 70 年代最早移民菲律宾的中国人，主要是投靠他们在菲律宾的直系亲属。这充分说明了一点，即历史上形成的移民网络构成了当今移民潮的基础。而随着大量中国人逐渐外移，通过跨越国际空间的社会关系的建构，移民过程得以自我维系，^[9]并且进一步鼓励了以家庭团聚、亲友、同乡关系为基础的连锁移民。这种移民网络的不断扩大和发展，成为潜在移民可资利用的“资本”。

但是，早期移民留给后续者的不仅仅在于移民网络，还在于这些移民在海外奋斗、发迹等或真或假的故事所构建的、不同于其他区域

如李明欢在《“侨乡社会资本”解读：以当代福建跨境移民潮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 年第 2 期，第 38~49 页）一文中，基于福建对欧洲地区的移民经验，提出以“侨乡社会资本”来对福建地区的移民进行理论解读。

见 Teresita Ang See, *Ibid.*, p. 138; 同时也见笔者在菲律宾的实地调查。

的移民文化和社会氛围。新经济移民理论认为，家庭移民不仅仅是要提高绝对收入（Absolute income），还要提高相对于群体内其他人的收入。通过人口的国际流动，家庭试图缓解他们的“相对失落感”（Relative deprivation）。相对失落感取决于家庭在收入分配上所处的位置，处于收入分配底端的家庭比处于顶端的家庭更容易产生移民。^[10]这其实也说明移民行为对移出地的影响不仅仅限于经济方面。此外，累积因果说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人口、商品、思想的流动在迁出国和迁入国创造了一种包含价值观、行为和态度的新的跨国文化，并因此形成一种新的、相当自主的跨越国境的社会空间。这种跨国文化改变了移民行为发生的背景，使国际移民得以强化并且延续。比如说移民展示了一种得到广泛认可的、他人想要仿效的生活方式。通过消费和购买能力，物质上成功的移民起到了一种强有力的示范效应，尤其是对年轻人。^[11]

从这一假设出发，长期的、大规模的移民实践无疑深刻影响了福建侨乡地区的社会文化，影响了在这种文化和社会氛围中耳濡目染的个体。在笔者的采访中，部分受访者表示，尽管在移民之前对菲律宾一无所知，但早期移民成功的示范效应以及更早时候老华侨或者菲律宾华人衣锦还乡的诱惑——包括他们在祖籍地所受到的种种尊重，通过捐赠家乡公益事业而享受的种种赞誉以及新时期新移民海外创业的传奇故事，都构成了一种对异域的美好想象，从而成为他们改变现状、移民海外的强大动力。部分受访者还表示，尽管目前福建部分地区的经济状况不错，吸引了很多外地人前去打工，但对福建本地人来说，打工并不是一件体面的事情，他们梦想的是自己当老板。在菲律宾，即便是经营零售店，也毕竟是当老板，身份不同了，这可以说是典型的“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面子思想在作祟。这种攀比的思想可能也是侨乡移民文化的一部分。

这种“面子”因素也存在于中国新移民生活的其它领域。部分经营不成功的受访者表示，因为没有发财，所以没脸回家，以免被乡邻嘲笑，更担心乡邻上门提亲。因为在福建农村，提亲成功之后男方往往要为女方提供一笔不菲的彩礼，这会让他们非常尴尬，也非常丢面子，所以他们往往宁可“赖”在菲律宾。

因此，在福建侨乡地区因历史原因形成的移民网络以及与此伴随而生的移民文化，构成了该地区居民移民海外的“社会资本”，是保证移民得以延续的内在机制。相比之下，对中国内地贫困地区的居民来说，他们既没有受到移民文化的浸染，又缺乏移民网络的支持，除非有特别的诱因，如海外招工或者其他经济机遇，否则难以形成一定规模的移民。因此，有学者强调收入并不是分析移民原因的关键变量，从个体所处的社会背景出发，可以更好地理解移民现象。^[12]

（二）推—拉因素

1. “推力”：中国内部的机遇

据笔者的抽样调查，菲律宾中国新移民大部分来自中国的农村地区（55.9%），来自小乡镇和城市的比例分别为14.7%和29.4%。在出国之前，“家庭富裕”的比例为25.9%，绝大多数人家境一般（64.7%）。实际上，即便在中国作为经济大国崛起的今天，它为其庞大的人口提供的致富机会仍然有限，此外中国经济发展还存在严重的不均衡，不论是城市和乡村之间，还是不同地域之间，都存在严重的经济分化。为了化解庞大人口造成的就业压力——尤其是来自中国广大农村的富余劳动人口，人口迁徙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的选择。于是，中国社会大致产生了两种人口流动：第一，中国社会内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如由农村到城市、由西部到东部、由相对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或中心城市的人口流动等。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全国有流动人口14,735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为4779万人；2007年的全国流动人口则为1.27亿。另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2月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农村总劳动力资源为5.31亿人，其中外出从业劳动力就达1.32亿人。^[13]第二，从中国大陆——尤其是东南沿海的侨乡地区向海外流动。尽管福建地处东南沿海，但它是中国东南沿海

地区中经济相对比较落后的省份，它本身没有能力消化农村大量的富余劳动力。这样的客观现实迫使长期浸淫于移民文化中的福建居民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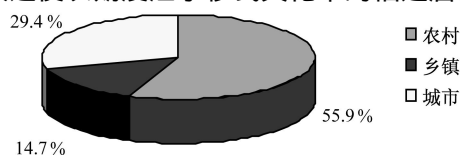


图1 出国前家庭来源地

求生的目光投向海外。当然，与国内庞大的人口流动相比，中国海外移民在规模上要小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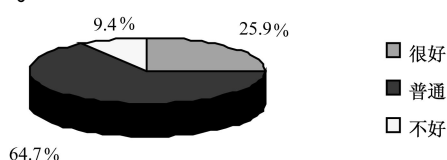


图2 出国前家庭生活水平

数据来源：笔者在马尼拉中国城的田野调查。以下图表中的数据均来自笔者在马尼拉中国城的田野调查，不再一一注明。

2. “拉力”：菲律宾的比较优势

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国际移民取决于当事人对付出与回报的估算，如果移民后的预期收入明显高于为移民所付出的代价，移民行动就会发生。当然，移民对回报与收益并无法做精确的估算，往往只是对未来收益的一种预期，因而带有一定的风险。笔者认为，移民个体会倾向于选择充满机遇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大多数时候是发达国家和地区，但有时候却不一定是工资水平最高或者富裕的地区，而是能够实现移民预期的地方，即对未来收益的预期引导了移民的流向。对中国新移民来说，菲律宾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虽然落后，但充满了机遇；只要努力，就能够实现预期的收益。当然，这样的预期基于一系列现实条件，即菲律宾的比较优势和特殊机遇。

在笔者的访谈和调研中，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谈到了菲律宾以下一些共同的优势：

——成本优势。大部分受访者表示，在中国大陆做生意成本太高，如商铺租金高，租期偏长，普通人在创业初期无法承担过高的费用。而在菲律宾，商铺费用低，租期灵活，能以较低的资金启动生意。因此不少新移民在抵达菲律宾一周之后即开始经营杂货零售店。

——菲律宾人购买力强。受访者表示，菲律宾人天性乐观，不管富人还是穷人都喜欢消费，而且购物爽快，不像中国人和菲律宾人那样习惯精打细算，因此整体购买力非常可观。向菲律宾人，尤其是菲律宾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销售来自中国的便宜商品蕴含着无限的商机。^[14]

——菲律宾商业竞争程度。吴文焕在谈到菲律宾华人的经济优势时认为，华人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商业传统和浓厚的商业气氛，由此使华人在商业上处于优势地位。^[15]其实无论是华人还是中国人，和菲律宾人相比，他们似乎更具有商业意识。很多受访者表示，由于菲律宾人的商业意识不那么发达，本地的商业竞争也不如中国内地激烈，市场成功者也不会像中国那样引发大规模的同行模仿行为。因此，只要大脑灵活，工作努力，凭借移民网络的支持，新移民可以做到小本谋大利。

——信誉好。这是绝大多数中国新移民所公认的。他们认为，无论是菲律宾华人还是菲律宾人，他们的信用普遍较好。

——令人尴尬的是，腐败和执法不力也成了菲律宾在商业上的一个优势。在美国和西欧等西方发达国家，受当地法律所限，非法移民大都只能打黑工。而在菲律宾，尽管法律对外国人零售做了非常严格的限制，但实际上大多数中国新移民都在非法从事零售业，菲律宾政府对此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此外，向官员和警察行贿，在菲律宾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不少新移民坦承，只要有钱，在菲律宾就没有办不到的事。

3. 中国城：移民网络的优势

自16世纪以来，移居菲律宾的华人被当时的西班牙殖民统治者赶到马尼拉帕希格河（Pasig River）北岸的Binondo区聚居。此后经过数百年的长期移民，逐渐形成今天规模庞大的“中国城”（Chinatown）。作为一个容纳菲律宾华人的移民网络和社区，中国城今天依然

是吸引中国新移民的强大“磁场”，为中国商人的生活 and 商业提供了便利。

这种优势首先表现在语言上。如图 3 所示，尽管身在国外，但大部分中国新移民的工作语言仍然是他们的母语闽南语（88.2%）。这是因为他们无论生意上的伙伴，还是日常生活中的交往对象，都以中国商人或菲律宾华人为主。其次，中国商人大多经营杂货零售店——其进货渠道和商业信息来源主要依靠群体内部。因而尽管熟练掌握他加禄语的人尚不足三分之一（对英语的掌握更为薄弱，见表 1），但通过电子计数器或者聘请菲律宾店员，他们能在很大程度上跨越零售环节的语言障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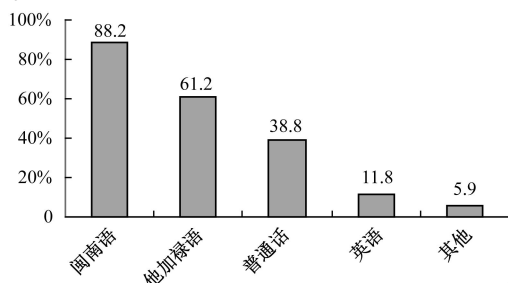


图 3 工作语言

其次，基于移民网络和传统文化而形成的信用是在中国城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法则。很多中国移民在抵达菲律宾的数周甚至数天之内即可开始自己的零售生意，即便他们并没有雄厚的资金，这是因为信用作为传统中国人的经商准则，在中国城的网络中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依靠亲朋好友或自身的信用，任何人都可事先设定好还账的期限，从批发商那里赊货来进行无本销售。还账期限少则一个月，多可达 4~5 个月。而一旦无法按期还账，信用崩溃，对生意者而言就是致命的打击，但绝对多数人都非常珍惜这种信用。^[16]这很可能因为，作为离开原有生活场的外来移民，他们在海外

在一次对中国商人和菲律宾华人的采访中，笔者和菲律宾华人之间说英语——因为对方不懂普通话，笔者既不懂他加禄语，也不懂闽南语；而菲律宾华人和中国商人之间则通过闽南语进行交流。我们必须使用三种语言来进行沟通。

部分受访者表示，他们都曾接受过短期的他加禄语培训班，而且菲律宾他加禄语中的部分词汇源于闽南语，这降低了他们学习他加禄语的难度。

一位受访者表示，他所遭遇到的未能按期支付货款的现象非常罕见，二十年来可能不到 2%。

所能依靠的资源有限，而信用则可确保他们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维持商业运转。一旦信用受损，在资源与人际关系都有限的情况下，可能对他们的商业构成致命的打击。这在客观上迫使他们重视信用在商业领域中的作用。

表 1 语言能力

	完全可以	一般交流	基本不能
他加禄语	31.8%	60.0%	8.2%
英语	2.4%	50.6%	47.0%

中国城的网络优势还表现在人际关系、信息与货流领域，这甚至是菲律宾本土商人所无法获得的竞争优势。在中国城所在的 Binod-Divisoria 地区，大量的购物中心如 168、Divisoria、Tutuban、Baclaran、Quiapo 等构成了一个商业网络，新移民“足不出城”就可以在这里获得大量的商业信息和足够的货源（主要是中国商品）。正是这种移民网络提供的便利，降低了移民海外后生活的风险，从而刺激了一大部分人的移民冲动。

4. 网络的拓展：族群经济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发达国家存在双重劳动力需求市场（dual labor market）和工作上的等级（job hierarchy），即处于顶层的高收入、正规的高级劳动力市场以及处于底层的低收入、非正规的低级劳动力市场，前者与“现代的”、“工业的”和“好工作”等联系在一起，后者则往往与“传统的”、“农业的”、“坏工作”等相关联。低级劳动力市场因其低收入、不体面或工作条件恶劣而对本地工人缺乏吸引力，但又是国家经济不可或缺的——否则产业和技术就可能流失到国外，因此形成需求空缺，客观上吸引了不发达国家的外国移民，后者在工作选择上具有更多的弹

性。^[17]此外，尽管这些部门的工资低，但仍高出不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

倘若如此，该如何解释中国公民向不发达国家的流动呢？特别是像菲律宾这样的国家，经济落后，工资水平低下，近 10% 的人口常年在海外打工。如果说在东南亚历史上的殖民经济结构中，华人往往扮演着殖民者和本地人之间中间商的角色，构成了当地商业领域的一个环节，那么今天的中国新移民在菲律宾这样的不发达国家的经济体系中又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

在马尼拉的 Binodo-Divisoria 地区，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陆续兴建了很多商场，比较著名的有 168（一路发）、Divisoria、Tutuban、Baclaran、Quiapo 等，这些购物中心看上去与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没有任何区别，其中的商铺差不多 90% 以上为中国人所拥有，经营零售店铺成为绝大多数中国小商人的职业（61.8%）。虽然也有相当比例的新移民经营公司（35.3%），但大多属于贸易型公司，兼营零售和批发，如中药店，而生产型企业较少（见图 4）。此外，他们还是供给全菲各地货物的批发商。据说菲律宾约 70% 的货物，都来自该地区的批发商，^[18]而这些批发商中新移民占了很大的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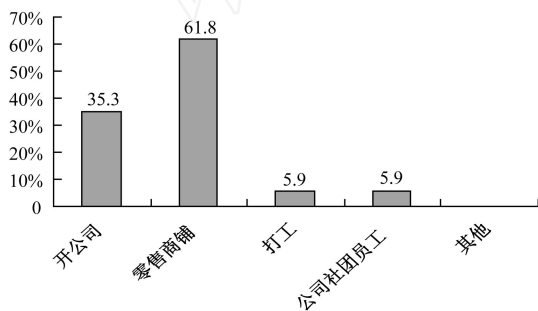


图 4 职业选择

由于中国商人的大量涌入，他们从某种程度上取代了昔日菲律宾华人的地位（这也导致了双方在零售和批发业的冲突）。如果说中国新移民在部分发达国家作为低层次的劳动力

填补了当地的劳动力市场，那么在菲律宾这样的欠发达国家，中国新移民构成了当地商业流通的一个环节，并且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以马尼拉中国城为基础，辐射菲律宾其他各地的少数民族经济（the ethnic economy）。这种少数民族裔经济的表现形式，如图 4 所示，大多以小零售商、雇员、小规模贸易商和批发商为主，同时还包括少数由这一群体经营的生产性企业和服务业。如上文所言，中国新移民大多来自中国的乡村地区，经济能力一般，因缺少资金积累，大多数人只能选择成本低、投资少、操作简单且赚钱快的零售店铺生意。但凭借对中国市场和商业渠道的了解以及移民网络的支持，新移民能以此在中国城站稳脚跟，并且把商业活动——主要是零售业——扩展到中国城以外甚至马尼拉以外的其他城市。

此外，中国新移民围绕马尼拉中国城而展开的经济活动，表现出某些聚居区族群经济（the ethnic enclave economy）的特征：第一，族裔群体内拥有相当大比例的雇主即创业者和企业家；第二，它的服务对象不仅仅限于本族裔的成员和社区，还致力于满足主流社会大众的消费需求；第三，可能是最重要的条件，即聚居区族群经济需要一个特定的区域，即一个族群聚居区来支持。^[19]

首先，早期移民所建立和形成的中国城正是这样一种族群商业聚居区（ethnic-business agglomeration）。作为密集的族群社会关系网络，它不仅强化了群体内部的信任与团结的规范——这是他们在海外经济活动的核心，让他们在贸易和中间商活动中拥有特别的优势，^[20]而且它本身就为后来者提供了精神和经济收益上的社会 and 道德资源。^[21]比如说，商业上或生活上依附于中国城的华人类群为了生存、发展和延续，本身就会消耗大量的资源——而且偏好中国商品，这就为新来的移民提供了商机。笔者注意到，无论是 Divisoria 的中国城，还是 Green Hills 新兴的中国移民商业圈，都提供了大量来自中国的商品——因为这两个地方都居

位于大马尼拉区 Binodo-Divisoria 的中国城是作为传统的华人聚居区而存在，而在大马尼拉区的 Green Hills，一个新的“中国城”正在形成之中，这里同时也是富裕华人的生活社区。

住着大量的华人。当然，与菲律宾华人相比，中国新移民的商业活动对中国城更为依赖。至于生活在马尼拉中国城以外的中国移民，如宿雾（Cebu）、达沃（Davao）、碧瑶（Baguio）——这些城市的中国移民也日益增多，则通过中国新移民的社团以及传统的亲情、友情和同乡关系，建立族群之间的网络，共享着商业和生活信息。少数经济上成功的中国新移民，加入众多的中国新移民或者菲律宾华人的社团，与华社保持着密切互动的同时，正试图与主流社会建立日益密切的关系。其次，中国新移民在中国城的零售店生意，其服务对象不仅仅限于本族裔的成员和社区，作为开放式的购物场所，还致力于满足主流社会的消费需求，其消费对象实际上以菲律宾人为主。第三，尽管大多数中国新移民仍然以零售业为主，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渗透到制造、房地产等领域，他们对菲律宾市场的依赖甚于后者对他们经济活动的依赖，但这仍然是某种形式的创业（self-employ）。

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大多数中国新移民在菲律宾选择经营零售店？据笔者观察，现阶段中国新移民在零售领域的活动已经形成了较具规模的积聚（clustering）特征，是结构性因素还是文化环境因素的影响？结构性因素包括族裔群体在居住国的社会地位、居住国政府的移民政策以及主流社会对他们的接纳程度等等。中国新移民之所以主要选择零售业，除了上文提到的成本低、投入少、赚钱快以外，还有他们自身的原因，如教育程度低、缺乏技能和足够的资金等，同时还受结构性因素和文化环境因素的共同影响。首先，因为大多数菲律宾中国新移民都不具备合法的证件，他们在公司或企业里获得职务的机会也就较少。此外，尽管

菲律宾政府对外国人零售也做了非常严厉的限制，但因政府部门执法不力，更因为中国新移民凭借网络的支持，仍然可以轻易获得零售营业执照——包括使用他人的经营证件。其次，前期移民的示范作用、中国城传统的小商业模式、移民网络共享的资源与人脉以及与中国联系的便捷，都推动了新移民在创业伊始，习惯性地选择零售业，于是出现了今天马尼拉 Binondo-Divisoria地区中国新移民大规模积聚于零售业的景象。第三，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经营杂货零售虽然辛苦，但毕竟是自己当老板，而且收入会比替别人打工更高。因此，一些人即使暂时在社团或者公司里任职，一旦时机成熟，也会选择辞职创业（self-employ），仅靠工薪工作（wage employment）生活显然不是他们最初的移民理想。另根据 Portes 和 Rumbaut 在 1997 年的数据，在美国的日本人、印度人、韩国人和华人与其他少数族群相比，拥有自己公司的比例最高。对此最为普通的一种解释就是文化。^[22]

不过，族群经济对潜在移民的“拉力”不能过分夸大。毕竟中国新移民的目的地还包括了这样一些国家：历史上既没有大量的华人移民，现实中更无族群聚居区或族群经济。对机遇的向往以及移民自身所富有的冒险精神似乎也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尽管菲律宾存在绑架、腐败、基础设施落后等等迫使菲律宾人离开他们的祖国而移民他国的原因，但中国移民在这里看到了更好的商业机会以及增长和发展的潜力。^[23]这种乐观的态度在于菲律宾的比较优势、菲律宾中国城的移民网络以及基于网络而形成的族群经济。这一系列因素共同催生了三十年源源不断

目前在菲律宾，存在三个中国新移民社团：中国商会、旅菲华侨工商联总会和旅菲校友联，其中中国商会正逐渐与菲律宾的一些政府机构建立起联系。

以菲律宾中药店为例，马尼拉的中药店近几年发展非常快，除了满足华人/中国人的需要外，也日益受到菲律宾人的青睐，参见 [菲]《世界日报》2003年3月5日。

如一位女性受访者白天和儿子轮流打理店铺生意，晚上她儿子还要到街上夜市摆摊到深夜，即使如此，生意也非常惨淡。而一位事业有成、从事制造业的新移民告诉笔者，中国新移民一般倾向于自己创业，即使在公司里工作，流动性也非常大，这一点和菲律宾人有很大的区别，后者更能接受工薪工作，因此他的公司更倾向于招聘稳定性强的菲律宾员工。

的移民。

(三) 其他原因

当然, 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促进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以来中国人向菲律宾的移民。70 年代以来中菲经贸关系的发展, 尤其是 90 年代以来中国商品向东南亚的大量涌入, 都带动了大量中国商人的跨境流动。此外, 中国在菲律宾承包的工程项目以及劳务输出, 也带动了中国人向菲律宾的移民。在菲律宾北部的苏比克湾经济区和基地, 一些中国公民合法进入后, 随后在当地非法工作。部分人则借道上述两地, 潜入马尼拉或者其他城市, 长期滞留在当地工作, 成为非法移民。2007 年 8 月 16 日, 91 名中国籍建筑工人在菲律宾克拉克基地被捕, 其中 63 人被指控无证件在菲律宾工作。^[24]此外, 交通便利, 移民成本低廉, 入境和居留管理远较发达国家宽松,^[25]都刺激了中国人向菲律宾的移民。

至于有学者谈到其他原因, 如违反计划生育政策, 或者希望多生育小孩、追求华侨身份所能带来的好处等等,^[26]其实只是非常罕见的个案。

结语

显然, 不发达国家同样可以成为移民的目的地, 甚至是发达国家移民的选择。以韩国为例, 尽管其经济发达, 但其国民依然大量移居菲律宾、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菲律宾的韩国永久居民据说已达 4.6 万人, 仅据菲律宾移民局的资料, 在菲律宾从事非法零售的韩国移民就高达 9 万人之多。他们以经营餐馆、零售店、语言学校等为生, 在菲律宾的各大城市随处可见, 并且也因为他们的“狂妄自大”、“无礼”、“刻薄”、“破坏菲律宾的制度”而饱受菲律宾人的批评。交通便利、英语环境、生活成本低以及韩国投资与贸易的对外发展, 都是推动韩国人移民菲律宾的原因。^[27]在巴西, 1998 年的大赦中, 共有 37,497 人申请办理了巴西临时身份证, 其中韩国人有 644 人,

仅次于玻利维亚人和中国人。^[28]同样在巴西, 因其对外来移民的宽容, 吸引了包括意大利、德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移民去创业。因此, 笔者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 移民不一定是沿着从低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的方向迁移。在菲律宾, 正因其商业经济的落后, 因此隐含着无限的商机, 吸引了大批中国新移民和韩国新移民来此地创业, 是“机遇”而非富裕与否吸引了新移民的到来。基于此, 倘若站在道德的高度, 以 20 世纪 50 年代新中国成立后, 大量华侨从海外回国参加国家建设为对照, 指责今天的中国新移民道德沦丧和“金钱至上”,^[29]似乎就过于偏颇, 而忽视了整个世界范围内移民流动的趋势与特征。

第二, 从移民网络的角度来看, 网络是使移民长盛不衰的机制, 因为新移民创造了维持后续移民所必需的社会结构。通过承载着互惠义务的社会关系——这一义务基于亲情、友情和乡情, 移民与潜在移民被联系起来, 而潜在移民凭借这些关系获得在海外工作的机会。于是, 向特定地区的移民将更多地是由移民网络的联系程度以及在移民网络中积累的社会资本等因素来决定。^[30]这是否意味着如果不考虑移民迁入国的移民政策这一因素, 我们就可以得出菲律宾的中国移民社会将日益膨胀的结论呢?

笔者认为, 答案恰恰相反。正如外劳的大量引入会导致市场饱和一样, 即使菲律宾现行的移民政策维持不变, 市场本身就会对移民规模做出自动调整。首先, 尽管少数成功的新移民在经过资本积累之后, 会转向其他投资领域, 但毕竟无论是聚居区族群经济的市场规模, 还是菲律宾的零售市场, 其容量都是有限的。大量中国商人涌入的一个结果就是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恶性竞争, 如新移民之间、新移民与菲律宾华人、新移民与菲律宾商人之间的竞争。这一点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 比如说, 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移民局和税务局等机构对中国城购物中心发动的各种检查和搜捕活

^[24] “Puzzling inward migration to RP”, *Philippines Daily Inquirer*, August 11, 2002; “The ‘Korean Wave’ in the Philippines”, *The Korea Times*, December 15, 2005. 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是, 目前韩国人在菲律宾有几十万之多。

动，往往是因为受到诸如菲律宾零售商协会等机构对中国商人“不公平竞争”的检举。^[31]此外，财富的积累不再像以前一样容易，后来者的市场进入成本日益高昂，部分人连最起码的生存都有困难。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之后，很多人将被迫退出，重新做出选择，甚至包括离开菲律宾回国。其次，如果移民未能在强化群体内部关系的同时，与主流社会建立起密切的关系，甚至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就有可能引起主流社会的敌视，从而导致当地政府采取措施限制外来移民。基于此，菲律宾中国新移民的规模不会无限制地扩大，其命运将由菲律宾政府和市场共同决定。

[注释]

[1] 《华人新移民心声：愿祖国日益繁荣强大》，《文汇报》2002年2月25日。

[2] (Philippines) *Tulay*, June 5, 1995; *Tulay*, January 6, 1997; *Tulay*, August 5, 1996

[3] “Chinese traders is first recipient of PR’s jobs generation visa”, www. cbs-cbnnews. com, April 7, 2009.

[4] Everett S Lee, *A Theory of Migration, Demography*, Vol 3, No 1, 1966, pp. 50 - 52

[5] Douglas S Massey, Joaquin Arango, Graeme Hugo, Ali Kouaouci, Adela Pellegrino, J. Edward Taylor, “An Evaluation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eory: The North American Cas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20, No 4, 1994, pp. 711, 701.

[6] *Ibid*, p. 711.

[7] *Ibid*, pp. 699 - 751; 李明欢：《20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周聿峨、阮征宇：《当代国际移民理论研究现状与趋势》，《暨南学报》2003年第2期等。

[8] Douglas S Massey, Joaquin Arango, Graeme Hugo, Ali Kouaouci, Adela Pellegrino, J. Edward Taylor, pp. 728, 731.

[9] Alejandro Portes, Ruben G Rumbaut, *Immigrants America: A Portrai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rd edition, 2006, p. 356

[10] *Ibid*, p. 714

[11] *Ibid*, p. 737.

[12] Michael J. Piore, *Birds of Passage: Migrant Labor and Industrial Societ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8

[13] 《中国网》2008年10月23日。

[14] 还可参见 Roel Landin, “Paradox for Philippines as Chinese Set up Shop”, *Finance Times*, July 24, 2007.

[15] 吴文焕：《华人经济的优势》，《关于华人经济奇迹的神话》，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出版，1996，第51页。

[16] Gary S Fields, “Segmented labor market model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R Collection of Cornell University LR School*, 2008; Michael J. Piore, *Ibid*, pp. 44 - 49.

[17] Michael J. Piore, *Ibid*, pp. 86 - 101.

[18] Catherine Gueguen, “Divisoria revitalized by new waves of migrants”, *Tulay*, Sep. 19, 2006; 李天荣：《中国新移民，菲国新动力》，香港：《亚洲周刊》2002年8月30日，第7页。

[19] Alejandro Portes, Robert D. Manning, “The Immigrant Enclave: Theory and Empirical Examples”, in S. Olzak and J. Nagel eds., *Comparative Ethnic Relations*, Orlando, FL: Academic Press, 1986, p. 47, 转引自周敏：《少数族裔经济理论在美国的发展：共识与争议》，《思想战线》2004年第5期。

[20] Claire L. Adida, “Beyond the Immigrant Ethnic Economy: A Network Theory of Socio-economic Wellbeing”, Paper for the Society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Graduate Student, Retreat, Stanford University, May 5 - 7, 2006

[21] Alejandro Portes, Ruben G Rumbaut, *Immigrants America: A Portrait*, pp. 63 - 64.

[22] *Ibid*, pp. 81 - 86

[23] *Philippines Daily Inquirer*, August 11, 2002

[24] “Sino workers face deportation”, *Tulay*, Sept 4, 2007.

[25] 庄国土：《经贸与移民互动：东南亚与中国关系的新发展》，《当代亚太》2008年第2期。

[26] “Wary of the New Wave”, <http://www.pcij.org/i-report/2007/chinese3.html>

[27] Virginia A. Miralao, “Understanding the Korean Diaspora in the Philippines”, Virginia A. Miralao, Loma P. Makil, *Exploring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in the Philippines*, Philippine Social Science Council, 2007, pp. 29 - 34.

[28] 袁平：《巴西大赦前后》，[巴西]《枫华园》2001年第299期。

[29] Teresita Ang See, *Ibid*, p. 150

[30] Douglas S Massey, Joaquin Arango, Graeme Hugo, Ali Kouaouci, Adela Pellegrino, J. Edward Taylor, p. 734.

[31] “168 Mall in Binondo raided”, *Tulay*, March 21, 2006